

科 学 译 丛

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十三集)

科 学 出 版 社

科 学 译 叢

關於物種与物種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十三集)

C. C. 霍赫洛夫
B. H. 瓦西里耶夫 等著
И. И. 普列森特

余名崙 龔幾道 等譯
龐季平 俞志隆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8月

內 容 提 要

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在苏联仍在繼續進行中，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逐漸展開。科学出版社曾將有關的研究論文選譯成为“种內种間關係的研究”第一集，第二集，“物种变化問題的研究”等小册子予以出版。

本書依然是繼續以前出版的“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集，予以选輯出版的。这是第十三集，共选譯了四篇論文和一篇附錄。其中除普列森特院士的論文，其他各篇都是批評李森科院士的“科学中關於生物种的新見解”及“哲学問題”所發表的普拉托諾夫所寫的“物种与物种形成討論中的幾個哲学問題”等文。關於另一方面的文章將在第十四集中譯載“哲学問題”等刊物所發表的諾汶斯基等人的論文。

此書可作为學習達爾文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工作者的參考資料。

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十三集)

Дискусс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ып. 13)

原著者	[苏联] 霍赫洛夫等 (С.С. Хохлов и др.)
翻譯者	余 名 崙 等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東皇城根甲4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6年8月第一版	書号: 0454 印張: 3 23/25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67×1092 1/25
(京)0001-5,381	字數: 79,000

定價: (10) 0.55元

目 錄

擴大並深入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創造性討論.....	
.....苏联“植物学雜誌”編輯部(1)	
附錄: “植物学雜誌”編輯部所收到的有關物种与物种 形成問題討論的論文与來信簡述.....	
.....苏联“植物学雜誌”編輯部(19)	
“科学中關於生物种的新見解”和農業实践.....	C. C. 霍赫洛夫(34)
种是一种地理現象.....	B. H. 瓦西里耶夫(65)
發育生物学与物种形成問題.....	И. И. 普列森特(85)

擴大並深入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 的創造性討論

苏联“植物学雜誌”編輯部

(原文載於苏联“植物学雜誌”1955年第2期)

一年以前，“植物学雜誌”在作出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的幾點總結時曾經寫道：“討論還必須繼續和深入下去。最近討論中所探討的以及和 T. Д. 李森科的著作‘科学中關於生物種的新見解’有關的那些問題，可以認為已經解決。現在已經完全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他的整個觀念的沒有事實根據，理論上與方法論上的錯誤，以及實踐上的沒有效果。”*

分析了過去一年來苏联生物學的發展，使我們能夠看出，我們對 T. Д. 李森科“關於物種的新學說”的內容和價值的這一種否定的評價是正確的。

在這個評價中，並沒有“無根據的破壞威信和壓制抱不同見解的人”的情況。科學上的見解和派別的自由也包含評價的自由在內，評價愈確定愈明顯，科學上的論爭也就愈有助益愈有成果。

在過去一年中，沒有出現過一個有利於 T. Д. 李森科觀點而稍能令人信服的實驗，沒有發表過一個有利於 T. Д. 李森科觀點的嚴謹、科學、而有根據的論據，就連報導物種“產生”聳人聽聞的發現的文章，也顯得快要不見了。一如初料，舊種有機體中的新種有機體“微粒”始終沒有見到，這種“微粒”沒有能超脫與唯物主義生物學背道而馳的臆測範圍以外。

* 苏联“植物学雜誌”，第39卷，第2期，1954年，第220頁，或“關於物種與物種形成問題的討論”，第5集，科學出版社，第80頁。

同時，“產生”學說的事實根據的考證已在許多著述中得到發展和深入。如此一來，“吉里岑斯基千金榆榛子（дилижанская грабо-лещина）”的真相被徹底的揭穿了（見 А. А. 雅村科-赫曼烈夫斯基 А. А. Яценко-Хмелевский 的論文）。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所授命的專門委員會，詳細地研究了分析了一切有關於生長在里加附近帶有樅樹分枝的松樹的資料，作出結論，認為這種現象是接枝性的。

特別應該提出 Я. С. 莫基烈夫斯基 (Я. С. Модилевский) 與 С. С. 霍赫洛夫 (С. С. Хохлов) 的論文

Я. С. 莫基烈夫斯基曾引證了很多證明雜交過程在有花植物，包括禾本科植物在內的進化中起着作用的細胞-胚胎學上的材料。研究着 Т. Д. 李森科擁護者們用來作為物種“產生”的那些現象的研究者，沒有一個能夠忽視這種材料的。

С. С. 霍赫洛夫曾深入地分析了所謂硬粒小麥“產生”軟粒小麥的那種現象。他運用了 Т. Д. 李森科擁護者們自己所發表的資料，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早在討論開始時所講到過的那種推測，那就是這樣的“產生”現象不是別的，那只是雜交和雜種個體在後代中進一步分離的結果而已。

В. В. 斯克利帕岑斯基 (В. В. Скрипчинский) 的一篇論文有着很大的意義，他懷疑了用來證明“後天獲得性狀”的變異與遺傳的適合性的基本材料以後，在文中對春型轉變為冬型與冬型轉變為春型的實驗資料加以批判的分析。

德國遺傳學家包美 (H. Böhme,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關於營養雜交方面的一些論著，也同樣值得注意（見“論文目錄”），這些論著迫使修正許多過早推崇的見解。

巴拉諾夫 (П. А. Баранов)* 指出被 Т. Д. 李森科及其擁護者們所否定的多元體也有很巨大的實踐價值以後，重新引起了蘇聯科學家

* 巴拉諾夫論文的譯文請參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為蘇維埃農業服務的多倍體植物”。

对多元体問題的注意。如所周知,否定多元体的價值,曾引起过我們在多元体工作方面的中断,曾給農業上帶來一定的損失。

“產生”理論毫無疑义是与由於植物引种与馴化的結果所積累起來的許多事实相抵觸的,這一點 Н. В. 杜尔賓 (Н. В. Турбин) * 曾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研究者协会公報”中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又一次的着重指出。

用實驗証明植物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有种內競爭的最近論著曾經發表过。自然界中与栽培中的植物,它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真正規律远較 Т. Д. 李森科所提出的死板公式複雜得多。查瓦德斯基 (К. М. Завадский) ** 實驗研究的結果,是特別令人信服的。

Т. Д. 李森科見解已为國民經濟的實踐所徹底推翻,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Т. Д. 李森科認為有机界中不存在种內競爭,而提出了穴植造林的方法。科尔達諾夫 (В. Я. Колданов) *** 对这种方法的应用作了五年的總結,指出这种方法的根据是錯誤的。穴植造林法曾給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並使護田造林的觀念頻於喪失信用的危險。Т. Д. 李森科的方法已为 1954 年 11 月在莫斯科所举行的護田造林全苏會議所反对。會議並發表了全体苏联林学家的集体意見。

先進的播种和栽植農作物的正方穴播法是与 Т. Д. 李森科所制訂出來的方法不同的。这个方法当其在社会主义農業条件下產生時是以承認有种內競爭作为根据的。我們只須注意一下这种情况就足够了: 在作物進行正方穴播的時候,每穴適宜於留下不上二株的作物,因为稠密了就会使果穗發育不良而引起產量的降低。这是以理論原理的真理最高標準來提出这样的實踐的。

許多問題在理論方面的繼續討論,其所得出的結果都是不利於

* 杜尔賓論文的譯文,請參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第十集。

** 查瓦德斯基論文的譯文,請參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种內种間關係的研究”第一集。

*** 科尔達諾夫論文的譯文,請參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种內种間關係的研究”第一集。

物种“產生”学說的,而且应当滿意地指出,被分析的問題的範圍已被相当地擴大着。

В. Н. 瓦西里耶夫 (В. Н. Васильев) * 曾用地理学觀點分析过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某些問題; И. Т. 瓦西里岑科 (И. Т. Васильченко) ** 曾引証过物种形成过程的速度方面的資料; Н. И. 卡拉布霍夫 (Н. И. Калабухов) 曾解釋过近緣物种与种內分類的生态-生理学特性問題; В. И. 坡連斯基 (В. И. Полянский) 曾估計过適應性狀在分類学上的意义。在 Н. Д. 伊万諾夫 (Н. Д. Иванов), В. П. 苏卡切夫 (В. П. Сукачев) 与 Н. В. 杜尔賓在答覆自己的反对者的許多發言中, 曾引証了許多新的論据, 在討論開始時他們所發表的見解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列寧格勒大学所進行的討論, 其所發表的資料是極為有趣的。应当重視 Б. М. 科佐-坡連斯基 (Б. М. Козо-Полянский) 的論文***, 關於說明物种“產生”觀念的歷史的 И. И. 普查諾夫 (И. И. Пузанов) 的論文更应特別注意。И. И. 普查諾夫指出, 与其說是 Т. Д. 李森科在我國科学中恢復了反達尔文主义進化論者凱里盖尔 (Келлигер), 貝特松 (Бэтсон)、科尔仁斯基 (Коржинский) 与德-佛里斯 (De Vries) 等的觀點, 还不如說是恢復了在古代生物学中廣泛傳佈着的多多少少延續到 19 世紀上半葉的幼稚變相的宗教。

關於物种的学說, 其哲学一面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在討論方面生物学家能够从哲学家們期待些什麼呢? 首先, 是唯物辯証法的規律与範疇对近代生物学理論問題的应用上的深入研究。如对立的統一与鬥爭的規律, 量与質的过渡規律, 總体、特殊与單一, 本質与現象, 偶然性与必然性, 因与果, 整体与部分, 連續性与間断性等的範疇等等就是。所以我們应当欢迎“哲学問題”雜誌(第 6 期, 1954)編輯部所作出的關於在該雜誌開始物种形成理論的哲学問題的討論这一決定。我國哲学雜誌参加了苏联生物学家的創造性

* 請參閱本書第 65 頁。

** 請參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第十二集。

*** 請參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第十二集。

工作，可以認為，一定能促進生物學討論的理論水平的提高的。但是欲達到這個目的，須得要求哲學家們認真地去研究現代生物學，去研究生物學中大量、複雜、而相互矛盾着的事實材料與觀念內容，並要求完全從教條與誦經（начетничество）中解脫出來。沒有生物學問題方面如此深刻與全面的知識，哲學家們的努力就可能僅停留於表面的討論，並將帶來損害。

可惜，在“哲學問題”1954年第6期中所發表的Б. М. 卡加諾夫（Б. М. Каганов）與Г. В. 普拉托諾夫（Г. В. Платонов）* 的論文，雖然比不加批判的採用Т. Д. 李森科觀點的哲學家們有一定的進步，但對蘇聯生物學家卻很少有帮助。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種內關係問題做個例子。

生物學家С. С. 謝爾科甫尼科夫（С. С. Шелковников）所寫的確切地分析生物學中所謂“馬爾薩斯學說”的論文，在討論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如С. С. 謝爾科甫尼科夫指出，Т. Д. 李森科及其擁護者們所進行的反對達爾文學說中的“馬爾薩斯學說”的鬥爭，實際上只是削弱了我們與現代馬爾薩斯學說鬥爭中的障地而已。Т. Д. 李森科推論的一點是這樣的：馬爾薩斯用人口過剩去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人民的貧窮。因而在承認自然界中有人口過剩和由人口過剩而引起的種內競爭時，也就等於承認了馬爾薩斯學說——反動的政治學說之一——是正確的了。十分顯然，早已為馬克思主義所譴責的混淆自然界發展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就是這種論斷的基礎。可是在自己論文中以極大篇幅談過種內關係的哲學家Г. В. 普拉托諾夫，卻放過了Т. Д. 李森科這一哲學上的極大錯誤。

同時，許多哲學上的錯誤都具有錯誤的邏輯，並且各個錯誤都是牽連着的。這方面我們可以引証李森科新近在護田造林會議上的演說中所發表的意見：“即使我說，動物界、植物界及微生物界的種內個體的相互關係完全像有機體器官的相互關係一樣，這也是沒有一

* 請參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第七集及第十四集。

些錯誤的。”(“林業”, 1955 年, 第 3 期, 第 47 頁) 自然稀疏“完全是由於與樹幹自然整枝的同樣生理原因而發生的”(同期雜誌, 第 48 頁), 並且“必須着重指出, 自然稀疏或一羣樹木中個別一些幼樹的衰亡之所以發生, 並不是因為幼樹已經很拥挤, 而是為了在最近將來幼樹不致拥挤”。(同期雜誌, 第 48 頁) 在 T. Д. 李森科所發表的這些意見中, 首先, 是完全無根據地, 在實質上, 是完全錯誤地用有機體器官的相互關係的規律去解釋種內的有機體以及植物社會內的有機體的相互關係規律, 其次, 把森林中的樹木認為是有知覺性的, 說是為了將來不致拥挤, 它們知道應當死去。T. Д. 李森科解釋自然稀疏過程如此明顯的理論觀點仍然沒有更早地被着重指出。

許多我國的哲學家, 包括 Г. В. 普拉托諾夫在內, 他們的嚴重過失是在於他們在長時期中硬說 T. Д. 李森科這樣的一些觀念為生物學中辯證唯物主義的最近成就, 並且現在還多多少少在這樣硬說, 他們不在自己的批判中去幫助生物學家, 而卻去宣傳這些觀念。

Г. В. 普拉托諾夫現在已承認在自然界中存在有久已為大量觀察與實驗以及農業與林業實踐所證明的種內競爭, 的確, 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 Г. В. 普拉托諾夫還不甚理解有機界的這種過程, 卻表示要設法去搞清楚種內關係對有機體進化的作用。他根據新陳代謝首先是發生於有機體與環境之間, 而不是發生於某一物種的有機體之間這一點, 看出了“種內關係雖然也能够在新有機類型的發生過程中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絕不是這個新種形成過程的根本因素, 而且也絕不是它的主要因素”(第 121 頁)。如所周知, 無論是達爾文或是季米里亞捷夫, 大致上, 在達爾文主義者中間, 誰也沒有在種內關係方面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有機體變異的直接原因。這一些種內的關係是重要的, 因為在一定的條件下, 它們能以種內個體間的競爭表達出來, 這種競爭是由生活環境所造成的, 生物環境能引起自然地選擇更強與更適應於該環境的有機體。關於種內競爭在進化上的作用問題, 只有在充分地專門而具體地研究新陳代謝之下才能獲得解決, 而不是籠統地推論新陳代謝所能解決的。

从許多論文中可以看到，Г. В. 普拉托諾夫沒有把類型形成（變異）与物种形成（進化过程）區別開來。同時，他也沒有能够理解到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在於任何遺傳變異，不論是微細的还是巨大的，不論是一種性狀變異还是整个性狀綜合變異，都不是單獨地形成新种的。作为有机界發展中新質階梯的新种，並不決定於它与近緣物种之間是否存在有过渡類型，並不決定於新种与近緣物种雜交得到有孕性雜种或是全然不進行雜交，新种始終是由於自然選擇的根本原動力的歷史过程而發生的。忽視物种形成过程的歷史性和自然選擇的創造性作用，就会得出在哲学上为唯物辯証法思想所指導的苏联生物学家难以容忍的 Т. Д. 李森科見解中以及 Г. В. 普拉托諾夫見解中的物种“產生”的整个觀念。

Г. В. 普拉托諾夫在研究从舊种过渡到新种的过渡類型問題時說道：“根据辯証唯物主义，从一个質到另一个質的任何过渡皆是飛躍的，但是这种过渡或者是以剧烈地一次地消滅舊質產生新質的形式（“爆發式的”飛躍）而實現的，或者是以逐漸的質變形式（非“爆發式的”飛躍）來實現的。”（第 130 頁）这种見解是可能贊同的，但是 Г. В. 普拉托諾夫指責 Н. Д. 伊万諾夫攪乱了物种形成过程中的飛躍問題，却是难以理解的。Н. Д. 伊万諾夫恰好也記敘了如 Г. В. 普拉托諾夫所曾經講述过的意見。

現在仍舊來談一談在正確的哲学分析方面特別感到不足的所謂變異性的“適合性”問題。

当大家談到變異性的“適合性”時，通常總會把達尔文所提出的所謂一定變異列入到這一概念中去，也就是說大家都注意到變異性的定向性。Т. Д. 李森科解釋为物种“產生”的那些事实，自然不是这种意义下的“適合性”。不管 Т. Д. 李森科与 Г. В. 普拉托諾夫对外界条件在这些變異上的作用講了些什麼，但總依然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沒有以任何証据去加以証明的。不論是小麥“產生”黑麥，或是榛子“產生”千金榆以及其他等等，都沒有指明外界条件的作用。

在達尔文見解中的一定變異是在什麼样的条件下發生的，这些

變異的性質如何，它們在進化過程中起着什麼樣的作用——所有這些問題還需要深入地專門地去研究、實驗和觀察。如果像 T. B. 普拉托諾夫那樣把“適合性”觀念附加以適應性、合理性的意義，那末在斷言環境所引起的遺傳變異可能有用、可能無用、可能有害的時候，我們僅僅重複了區分達爾文主義與任何其他進化學說的這一種普遍知道的達爾文主義基本的唯物主義原理而已。

T. B. 普拉托諾夫所發表的一些見解，其本身的基礎上具有若干哲學範疇的錯誤理解。否定變異性的適應性，實際上也就是否定了生活的基本合理性，他把遺傳變異在其不適應性方面的偶然性與無原因性，和無定論混同起來了，並把“絕對偶然性”的某種荒誕的範疇引入到哲學中，因為他沒有提出它的定義，也沒有指出用什麼來把它與“非絕對的”偶然性區分開來。

* * *

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毫無疑義是具有巨大意義的，這種意義不可僅歸結於解決重要的然却是部分的問題——確定 T. Д. 李森科“關於物种的新學說”的毫無根據。在履行共產黨關於消滅生物學中的壟斷傾向，履行關於創造保證在我國科學任何部門中的自由的創造性討論與自由研究的條件的指示，討論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本來可以不必再提起在討論開始時曾經發生的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恫嚇或其他手段來阻止討論的這一件事，假如現在已沒有出現以隱秘的方式來阻止討論的話。

批評的置諸不理就是壓制批評的方式之一。在以“講演者手冊”叢書出版的 Г. К. 赫魯卓夫 (Г. К. Хрущов) 的小冊子“蘇聯生物學的成就”中，作者用二頁篇幅敘述了 T. Д. 李森科的一些見解。他給予這些見解以十分良好的評價，關於討論這件事，他什麼也不提及就用這一段話來作了結語：“這個理論的某些原理，自然還須要在實驗中和實踐中去加以檢驗。”（第 22 頁）科學家既有權利，同時也有義務。毋庸爭辯，Г. К. 赫魯卓夫有權利以他的科學良心要求那樣去對待 T. Д. 李森科見解，他有權利以全部熱情去保衛這些見解和予以

宣傳。但是，当他出現於廣大听众面前，实际上，也就是当他去指導千千万万講演者的時候，他有义务說，他和 T. Д. 李森科所發表的見解已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並已為大多數的苏联生物学家所反对。

“苏联大百科全書”編輯的态度是引人驚異的：在所預約的約在 1954 年 6 月 18 日出版的第 27 卷裏面，重新把 T. Д. 李森科關於物种問題的見解宣傳為科学上的最新成就。这一事实又一次証明了在这一重要出版物的生物学部分的嚴重不幸，它的極重要的許多論文，給予了人們一个世界生物科学狀況和苏联生物科学水平的歪曲的觀念。

不能不提出，这些論文的作者往往片面地闡釋所研究的那些問題，且对所報導的这些事实的可靠性未予应有的注意，这都会破坏作者們本身和苏联大百科全書如此重要的出版物的聲譽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遺憾的却是同時会使許多苏联讀者引入迷途。

司徒季茨基 (A. И. Студитский)* 在批評我們編輯部所發表的第一篇討論總結的論文時說道，在这篇論文中，对所有問題都作了与 1948 年全苏列寧農業科学院大会以後在我國生物学中已經建立起來的達尔文主义觀點根本相抵觸的結論，他說：“只有这样一个難於敢以怀疑或否定态度去談論的問題——關於獲得性的遺傳問題——沒有談到……。然而，每一个熟悉这一論題的生物学家都清楚，这一在許多年中存在着，而在資本主义及其意識形态还存在着今天仍然保留着的動植物有机体在生活中所獲得的性狀和特性的遺傳問題，是劃分生物学为二个不可調和的陣营的一个中心問題。”(第 242 頁)

这一發言的用意何在呢？想阻止对 T. Д. 李森科的物种觀念的批判沒有成功，討論已經開始和繼續在進行着，並已得出了一定的結論。現在，A. И. 司徒季茨基又以“資本主义的意識形态”嚇唬苏联生物学家來阻止这个科学問題——“獲得性”的遺傳問題——的自由討論。

* 請參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第八集。

其实，關於“獲得性”遺傳的學說，远在社会主义意識形态，甚至資本主义意識形态產生以前曾經出現過。無論在苏联生物学家当中，或在外國生物学家当中，这个學說的擁護者和反对者，現在仍都有之。这一事实很可作为說明：从二篇近年來在國外所發表的關於生物学上進化觀念的歷史的極完全的報導中，可以看到这一个報導——W. 秦曼尔孟 (W. Zimmermann)¹⁾——全然否定这个學說，而另一个報導——林德西 (A. W. Lindsey)²⁾——却全盤接受这个學說。若干資產階級科学家 [(我們姑且举出盖尔特維德 (O. Гертвита)，帕里亞吉 (Л. Пляте)，維吉姆 (У. Уэтема)] 从“獲得性”遺傳的學說出發，作出如此反科学的反動社会学性質的一些結論，而另一些科学家則从否定这种現代遺傳學現象出發，作出同样反科学的結論。

十分顯然，要求無可非議地進行實驗的“獲得性”遺傳問題，一定能被苏联科学家像对任何其他生物学問題那样自由地勇敢地去研究和討論的。

在苏联生物学的發展上，依然有着某些缺陷，那是必然的，而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已在促進着搞清楚这些不足之处。

討論的科学水平已为最近幾年來進理理論問題的嚴格研究工作的削弱所降低，某些科学工作者力圖“劃一”不同方向与學派，灌輸空論和壟斷精神，特別影响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植物学方面，在任何場合下，幾乎沒有出現關於某類植物，屬或科的進化的嚴格研究，沒有出現符合現代科学水平、应用極其多样性的科学方法而進行的研究。實驗工作的狀況特別不良。“植物学雜誌”在呼籲佈置較大規模的綜合性研究以後，依然沒有得到应有的反应，在實踐上沒有實現过这一呼籲。

不僅我們雜誌中的討論，而且还有其他科学出版物中的討論，在

1) W. 秦曼尔孟 (W. Zimmermann). 進化. 進化歷史的問題与認識, Müncher, 1953 年。

2) A. W. 林德西 (A. W. Lindsey). 有机進化原理, 聖路易士, 莫斯利書局出版, 1952 年。

進行時都沒有顧及到那些國外在做的關於進化問題的工作。在許多場合下，我們很少報導這些不論是實驗性的或是理論性的工作。最近幾年來，外國文出版社已經一篇也不翻譯關於達爾文主義方面的專門論文了。國外所出版的書籍，已經好多年沒有為我國雜誌所評論，其中也包括“植物學雜誌”在內。應當廣泛地展開唯心論與形而上學理論的批判，和發表外國生物學基本問題的意見。在這同時，應當從外國科學中吸取可以有益於我國科學的發展，有益於我國農業，總之可以有益於國民經濟的一切。然而我們必須去批判外國科學家的現代的見解，而不是做做 T. Д. 李森科擁護者們在批判遺傳學觀點時應用幾乎遠隔半世紀的文獻，而沒有考慮到現代科學的這種發展也可在最近的國外文獻中得到反映。這種嚴重的疏忽，不僅不良地影響到我國進化學說的發展，而且無疑地也阻礙了蘇聯科學家對外國科學的影響的擴大。重新改革高等學校與中等學校達爾文主義的教學，是成功地發展有機界進化問題的創造性工作的最重要條件之一，這些學校中的達爾文主義教學，不僅極為教條，而且簡直使學生們引入了迷途。

在作出以上所述的總結時，應當提出，在最近的討論論文中特別明顯地指出曾為 T. Д. 李森科所發表的意見，不僅給我國的農業與林業，而且也給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的生物學教學帶來如此的損害。

在 1954 年中，蘇聯生物學家極為滿意地証實了這一快慰的事實：除了“植物學雜誌”與“莫斯科自然科學研究者協會公報”生物學部分以外，“普通生物學雜誌”、“蘇聯科學院院報生物學叢刊”、“現代生物學的進展”等各雜誌終於也都給予了物種“產生”學說的反對者在這些雜誌上發表意見的可能性。不過這還是不夠的。每一個生物學雜誌都應該規定出討論新的原則性的問題，應該擴大討論的陣地，努力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崇拜任何科學假說和理論。

“植物學雜誌”仍將繼續在自己雜誌上討論作為重要生物學問題之一的物種形成問題，但是它中止如此地去繼續討論 T. Д. 李森科的物種“產生”學說，不過仍保留着重新刊載的權利，以便在出現某些新

材料或發表值得注意的意見時予以刊載。本雜誌擬採用的論文原稿，已有 50 篇以上*，但因篇幅所限未能發表。在這一期中，我們刊出了這些未發表的論文的簡述。編者謹向所有參加討論的同志表示謝忱。

應該記住，科學上的討論——這不是一個短暫的運動。科學上觀念的自由討論，科學上觀念的鬥爭——這是科學的存在和發展的形式。К. А. 季米里亞捷夫曾說道：“沒有一個地方的意見自由與創造自由會像科學部門的意見自由與創造自由那樣能成為一個勝利上如此重要的條件的，的確，也沒有一個地方的這種自由，能像在科學應用部門那樣得到如此豐盛的收穫的。”（季米里亞捷夫全集，卷 8，第 132—133 頁）在我國，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切使科學能如此發展的條件正在被建立起來，蘇聯科學家們應該不辜負人民的信任。

在蘇聯科學面前正擺着巨大的任務。今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月全體會議已在我們祖國的農業方面，特別是畜牧方面，提出了只有在一切科學戰線積極參加下才可能被完成的偉大工作計劃。蘇聯科學家們應當站在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前列，應當經常參與國民經濟問題的解決，應當為改善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和加強我們祖國的實力而努力。大家在為人民服務中，在為有機界發展規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解所進行的鬥爭中，發現了生物學中真正的米丘林方向的實質。

參考文獻 1)

- [1]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А. Д.,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та., № 10, 1954, с. 81—84. (亞歷山大洛夫：“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載“列寧格勒大學公報”）。
- [2] Баранов П. А., Полиплоидия на службу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ельскому хозяйству. Бот. журн., 39, № 2, 1951, с. 157—179. (巴拉諾夫：“為蘇聯農業服務的多倍體植物”，載“植物學雜誌”）。
- [3] Васильевская В. К.,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та., № 10, 1954, с. 65—66. (瓦西烈夫斯卡婭：“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載“列寧格勒大學公報”）。

* 見本論文的附錄。

1) 參見“植物學雜誌”，1954，第 2 期，221—223。

- [4] Васильев В. Н., Вид как явле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Бот. журн., 39, № 3, 1954, с. 380—393. (瓦西里耶夫: “作为地理学現象的物种”, 載“植物学雜誌”).
- [5] Владимиров О. И., О виде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и у животных. Зоол. журн., 33, в. 4, 1954. (烏拉季米洛夫: “論動物种与种的形成”, 載“動物学雜誌”).
- [6] Вовк А. М., Превращение вируса зеленой мозаики огурца в вирус белой мозаики. Тр. Инст. генет. АН СССР, № 21, 1954, с. 237—259. (伏烏克: “黃瓜的綠花葉病毒轉变为白花葉病毒”, 載“苏联科学院遺傳学研究所報告”).
- [7] Гербицкий Н. Л.,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10, 1954, с. 79—81. (盖尔皮尔斯基: “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 載“列寧格勒大学公報”).
- [8] Гиляров М. С., Вид, популяция и биогеоценоз. Зоол. журн., 33, в. 4, 1954, с. 769—778. (基里亞羅夫: “种, 种羣及生物羣落”, 載“動物学雜誌”).
- [9] Годлевский В. С.,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10, 1954, с. 75—77. (高特烈甫斯基: “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 載“列寧格勒大学公報”).
- [10] Горобец А. М.,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10, 1954, с. 74—75. (高罗别夫: “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 載“列寧格勒大学公報”).
- [11]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 С.,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10, 1954, с. 49—51. (達尼烈甫斯基: “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 載“列寧格勒大学公報”).
- [12] Дворянкин Ф. А., В защиту мичуринской теории онтогенеза. Усп. совр. биол., 39, в. 1, 1955, с. 111—125. (德沃梁金: “奋起保衛个体發育的米丘林理論”, 載“現代生物学的進展”).
- [13] Демьянов Г. П., Замечания о виде и некоторых сторонах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зоодогии. Зоол. журн., 33, в. 3, 1954, с. 525—536. (傑孟契耶夫: “關於動物学上物种与物种形成中若干方面的意見”, 載“動物学雜誌”).
- [14] Доброхвалов В. Догмы и жизнь.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Литерат. газета, 20 IV 1954. (多布羅赫瓦洛夫: “教条与生活”. 給同志的一封信. 載“文学報”).
- [15] Доброхвалов В. П.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учения И. В. Мичурина. М., изд. “Сов. Наука”, 1954. (多布羅赫瓦洛夫: “米丘林學說的哲學与自然科学前提”, “蘇維埃科学”出版社).
- [16] Живкин Л. 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10, 1954, с. 57—59. (森金: “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討論中的發言”, 載“列寧格勒大学公報”).
- [17] Завадский К. М.,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еходе “старой” наслед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новую.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4, 1954, с. 3—16. Рецензию на эту статью см.: Н. Д. Иванов, Бот. журн. 38, № 5, 1954, с. 776—778. (查瓦德斯基: “舊遺傳性向新遺傳性的过渡問題”, 載“列寧格勒大学公報”. 对该文的評論參見“植物学雜誌” 38, № 5 所載 Н. Д. 伊万諾夫一文).
- [18] Завадский К. М.,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теории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 Ленингр. ун-в., № 10, 1954, с. 3—15, 89—92. (查瓦德斯基: “論物种与物种